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NSC 90-2411-H-004-010-

執行期限：90年8月1日至91年7月31日

主持人：林能士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一、口之摘要

自中外貿易開通以來，廣州即以對外貿易的「單一窗口」而保有其不墜的商業活動，使其在唐宋以來，一直成為商業的重鎮與集散之地。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才造就了廣州商人對於商業貿易的深刻體驗，成為整體中國貿易網絡當中的重要角色。

然而這樣的角色，卻因為清末鴉片戰爭後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而改變，在開港的五個口岸當中，上海開放所帶來的衝擊無疑是極為顯著而影響深遠的。從貿易的數量與商業氣息來看，廣州的位置確實因為上海的開埠而略顯下降，在這樣的壓力下，廣州商人的心境與面對挑戰的群應，著實令人感到關切。

本研究以廣州商人的組織為切入點，討論在清末商業競爭下廣州商人的群應。在其他通商口岸的強大壓力下，廣州商人決心成立廣州商務總會。他們藉日商會的力量，投身於政治的運動，寄望在清末民初的幾次政治風潮中，提升本身的地位。他們在立憲與革命的抉擇當中，投向了支持革命的陣營。但是，他們期待的穩定局面，卻未因革命的結束而到來，國家政局反倒因此而更加地動盪不安；於是，他們在二次革命的聲浪裡，並不跟著起舞。袁世凱稱帝則又大大表對袁氏的不滿與怨懟。這種走入政治的舉動，同樣在五口運動的抵制外貨運動中表露無遺。

本文焦點集中在孫中山倡導護法時期的政商關係。自從孫中山回粵以來（1917），廣東地區便成為孫氏北伐的重要基地，而在此地的商人們，很直接地便成為護法政府所仰賴的經濟助力。但由於外來的軍事力量進入廣東，甚至喧賓奪主地讓孫中山憤而離粵（1918），因此商人對孫中山基本上是同情的。其後，雖然孫中山藉著陳炯明的粵軍回到廣東，但因是否立刻北伐的問題而使得孫、陳交惡，釀成「陳炯明事件」（1922）。孫（中山）的「武力統一」與陳（炯明）的「聯省自治」，在商人的眼中，其實都有利弊，但是期盼而造握手言和，以利商業發展終究是商人的心聲。事件過後，「聯俄容共」的政策，在國民黨內開始發酵，甚至於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成為法議

（1924），此舉不但使國民黨產生了新的變化，商人對於這個「反對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表示不滿，這樣的反感，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其後的「商團事件」（1924.8）。

「商團事件」最後以武力衝突解決，商人的武裝力量受到相當大的打壓，他們的心境與對革命政府的態度勢必有所轉變。因此，本研究將最後重點放在孫中山治粵後期的商人活動。孫中山去世之後，雖然國民黨政權在名義上成立了「國民政府」（1925），但國民黨內派系問題層出不窮，面對這樣的亂局，商人才自有定見。一九二六年一月，國民黨二次全代會召開，通過了《商民運動法議案》，法議案中對於商會當中的大商人予以貶抑，鼓勵中小商人成立商民協會與之對抗；但是不久之後，政府再度意識到，軍事行動的經濟因素，非大商人相助不可，因此，明令取消了商民協會。此後，商人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國民政府因此被評論為「資本家的政府」。政府需要商人的金援，商人需要政府的利商政策，兩者之間各取所需，漸漸成為後來政商關係相處的模式，直至今日，仍舊依稀可見。

關鍵詞：商人、廣州、政商關係

Abstract

In this project, the researcher will adopt a dynamic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that the Guangzho merchants played in the modern China (1840-1924.). In the beginning, the general merchants' organizations will be summarized. The foci of the research, however, will be placed on the "chaotic periods", namely, the collapse of the Qing Empire,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O.C., the division of the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benefit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government authority. Based upon observations of these periods, the researcher wishes to explore the following subjects: the ways the businessman gained or lost the control of political power; the wax and wane of the merchant group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role that the traders played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changes.

This research will take the Guangzho chamber of commerce (廣州商務總會) as a prime case and examine it's founding, processes, results, and consequence. In the end, we find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Guangzho merchants had consolidated the government's authority, and resulted in many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policy changes.

Keywords: Guangzhou merchant, businessman, Sun Yat-sen

二、緣由與目的

從自由經濟的角度來看，「管得愈少的政府，就是愈好的政府」；但是，從執政者的角度來看，管得愈少的政府，卻往往是個最無能的政府。因此，在經濟與政治的這場賽才賽中，如何取得一個平衡點，正是政治與經濟是否得以穩定成長的重要關鍵；而在這個關鍵點上的關鍵人物，正是那些亟欲獲取最大利潤的商人。

商人這份職業，在傳統中國以農立國的儒家思想裡，往往被視為一種層次較低的工作，儘管從商得以成為「富可敵國」的巨賈，但卻依舊被視為「匹民之末」。為此，商人紛紛利冊許多管道，無論是捐官買爵、或是造橋修路，希望能夠藉此獲得些許的掌聲與重視，以脫離「富而不仁」、「無商不奸」的刻板印象。

直到近代，商人的社會地位才開始有了轉變。姑且不論是「外力衝擊」或是「內部反應」的結果，商人地位的提升確實是有目共睹的。在重商思潮下，商業才成為許多知識份子口中的「立國之本」。正由於這樣的局面，讓商人開始在社會上嶄露頭角，並與政局變動息息相關。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以往的商人研究本來就較為欠缺，直至近年來商人研究成為一個較為熱門的課題，商人階級才漸次成為學術研究的焦點。不過，以往的研究多偏重於上海等長江沿岸的貿易口岸，對於其他地區的商人，似有不足之處，以偏促於南方的廣州為例，有些研究者便只將此處視為鴉片戰爭前之商業重鎮，使得廣州的重要性受到窄化與忽視。

晚清以降，政治上紛擾不休，擁有豐碩資源的商人階級，自然成為政治人物亟欲拉攏的對象。在清末民初這段政治擾攘的年代裡，商人們從他們本身的立場去考量究竟該作何選擇，而這些選擇才透露出商人這個族群的政治理念與所關切的方向。再者，從商人的角度首

政治，才是一個頗為新穎的嘗試，商人們如何在商業利益與國家利益當中取得一個平衡點，無疑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商人階級在這樣複雜的因素下如何做出抉擇，值得探討，而這樣的盤根錯節情形，在清末民初的廣州確實相當地明顯。

另一方面，偏促於南中國的廣州商人，他們的活動與同時期的上海商人、天津商人、瓜河港口商人有何異同之處？而上海之於外商、天津之於北洋軍閥、瓜地港口之於地方勢力，以及廣州之於孫中山，這些錯綜複雜的政治勢力與商業利益的纏繞，究竟又有什麼關連性與互通之處？凡此種種，都是亟待史家釐清的問題。

因此，本研究以「廣州商人的政治意識與政治參與」為題，探究清末以來廣州商人在政治勢力中的抉擇與角色扮演，並以商人與廣州地區的地方實力派為中心，討論彼此之間的互動。簡而言之，本研究試圖解決的問題有三：其一，政治力量的消長，對於商人階級的控制才是否有其絕對的關係？其二，商人面對混亂的政局，他們的態度是積極干預，或是消極面對？最後，廣州商人在清末民初這段紛擾的局面下，他們最終的抉擇是如何？什麼原因是他們抉擇的關鍵？若能深究這些面角，應可對清末民初的政商關係，建立一個較具規模的研究框架，並希冀以此為基礎，對近代商人與政治的糾葛，重新加以審視與評析。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為史料與檔案的閱讀與整理，除了對國史館典藏機構，諸如國史館、黨史會、中共研究院等地進行檔案查找外，並前往廣州幾個重要的檔案機構，如：廣州市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山圖書館、中山文獻館以及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希望能從所蒐集到的報紙、政府頒佈的法令以及當時人的回憶，還原較接近事實的歷史圖像。再者，本才利用政治經濟學的原理，檢視在這段時期的政商關係，與一般學理上所提出的現象有何相似或相異之處。最後，本才再以「國家與社會」理論的框架，探討商人面對政治力量的挑戰時所表現出的反應，分析了當政治力量漸漸強化時，社會力量開始向政治上的實力派靠攏，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商人將永久依附在政治力量之下；相反地，商人卻利冊其所擁有的經濟力量，對政治勢力做出有利己身的干預。

本才研究成果之綱目如下：

緒論

一、研究動機

二、文獻回顧

第一章 近代廣州商人的崛起

第一節 口岸貿易與商人的轉型

第二節 商會的興起與其影響

第三節 廣州商人的政治意識

第二章 廣州商人與護法運動

第一節 商人與廣東地方實力派的關係

第二節 遞嬗政權中廣州商人的群應

第三節 「聯省自治」與「武力統一」中的取捨

第三章 廣州商人與革命政權的衝突

第一節 商人對陳炯明事件的態度

第二節 商人對國民黨聯俄容共的首肯

第三節 商團事件的爆發及其原因

第四章 商團事件後與國民政府的互動

第一節 國民政府對廣州商會的控制

第二節 廣州商會與商民協會的抗衡

第三節 廣州商人與國民政府的關係

結論

同時，本研究得到下列幾點發現與討論：

(一) 廣州商人團體與其他地方的商人不同，光是廣州一地，便有四個不相隸屬的商會組織，分別為：廣州總商會、廣東全省商會聯合會、廣州市商會以及廣州商民協會。由於各商會之間的利益不盡相同，因此，他們對於地方實力派的依附程度與取法也有所不同。

(二) 以本研究的時代而言，在廣州經商和在中國其他地方經商，有顯著的不同。其不同點在於，廣州一地各政治勢力糾葛嚴重，包括了以滇、桂系軍閥為主的陸榮廷、楊希閔、劉震寰等地方實力派、陳炯明等廣東人為主體的軍事力量以及號稱國家正統之所在的孫中山等。其後，隨著聯俄容共政策的施行，中共勢力介入政治，使得商人對於孫中山的施政感到憂心與不安，遂有其後的商團事件。

(三) 除了中國內部的政治勢力外，列強的干預也多少影響了商人的利益。尤其是廣州地近香港，英國的勢力不容忽視；俄國勢力的介入，也使得商人的利益被侷限，也成為商人對革命政府支持與否的關鍵。

(四) 商人彼此之間的利害關係不同，因此，在幾次大規模的抵制外貨運動中，商人的立場並不一致。

(五) 廣州商人在清末民初的社會中，發揮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力，所謂「紳商」名詞的出現，意味著原本仕紳社會中的「鄉紳」，漸漸地與商人結合，甚至被商人所取代。

(六) 自中共介入革命政府以來，工人罷工以要求提高薪資的頻率增加許多。而當局也因聯俄容共的政策，對罷工採取支持的態度。但是到了國民政府時期，政府幾次下令要求約束罷工，並且對於罷工的條件予以規範和限制，足見政府已經意識到「勞資對立」中「資方」對於政治力量維繫的重要性。因此開始對勞方控制，以換取商人對政權的支持。

(七) 以往的研究成果當中，商人的角色多半是處於被動的，往往在事件發生的最後，才見到商人的動向。但事實上，廣州商人是一種對時局變動極為敏感的群體，早在事情未發之先，商人多已有本身的選擇方向，以期從中獲取最大的利益。而之所以會將商人歸類為被動的角色，除了對商人性格的錯誤認知外，資料的解讀不足也是缺失之一，因此，本研究從較多的原始史料當中，找尋商人動向的脈絡，藉此重新審視商人在時局動盪中的角色。

五、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的執行過程，堪稱順利良好。從縱橫的角度來看，以政治力量的遞嬗為主軸，分析政治消長的同時，商人如何利用機會，做出政治投資；從橫的比較而言，同樣身為商人，廣州商人面對來自內部的挑戰遠比其他通商口岸來得嚴苛，但他們卻憑藉著這些阻力，運用執政當局彼此之間的矛盾，找到一條生存之道，甚至成為政治勢力不可缺少的經濟支柱，這一點在清末民初的商人群體中，是頗為特殊的。因此，本研究不僅僅是填補了以往近代商人研究中的空缺，同時，也在過去既定的認知中，提出了一些較新的看法，諸如廣州商人組織的特質、外國勢力在廣州的糾葛、商人積極參與安定社會的事務等；對以往認為「商人無國界」、「商人被動性格」等既有觀點，則提出了新的詮釋。

此外，參與本研究的計畫助理，也在參與計畫的同時，對於檔案史料的蒐集、查找、分析以及考訂上有許多新的認識，對於史學研究方法的訓練上，也有不少進步，對於助理人員最後的史學研究，相信能有一定程度的助益。

五、參考文獻

(一) 檔案史料

1.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軍政府公報》，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民國74年。

2. 財政部財政調查處編，《各省區歷年財政彙覽》，台北：立海出版社，影印版。
3. 趙寧添編，《中華民國商業檔案資料彙編第一卷（1912-1928）》，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1年9月。
4. 廣州中國歷史檔案館編，《廣州國民政府檔案》，廣州：中國歷史檔案館，1986。
5. 廣州府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粵海關報告匯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1月初版一刷。
7. 李達嘉，〈商人與政府—1924年廣州商團事件原因之探討〉，《國史釋論》，上冊，台北：食貨出版社，民國76年11月，頁349-362。
8. 李達嘉，〈從「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關懷和抉擇，1911-191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期（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3年6月，頁237-282。
9. 徐鼎新，〈中國商會研究綜述〉，《歷史研究》，1986年第6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1986年12月，頁81-91。

（二）專著、學位論文

1.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東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百年大事記》，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
2. 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國父全集》，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3年2月。
3. 井泓瑩，《廣州商團事變》，台中：浪野出版社，中華民國81年3月。
4. 朱葉，《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以近代中國商會為主體的歷史透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9月。
5. 李達嘉，〈商人與政治—以上海為中心的探討（1895-1914）〉，台北：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83年。
6. 林能士，《經費問題與護法運動》，台北：大學搖籃出版社，中華民國84年3月。
7. 曾慶榴，《廣州國民政府》，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一刷。
8. 壽允一編，《近代中國工商人物志》（全二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2月。
9. 劉怡青，〈商人與軍閥政治（1916-1928）—以天津為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8年。
10. 郝延平，〈買辦商人—晚清通商口岸—新興階級〉，《故宮文獻》，2卷1期，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59年12月，頁35-44。
11. 張曉輝，〈論民初軍閥戰亂對廣州社會經濟的影響〉，《廣東社會科學》，1997年第6期，廣東：廣東社會科學雜誌社，1997年12月，頁87-92。
12. 趙洪寶，〈近幾年來大陸學者關於中國商會史研究綜述〉，《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6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2年9月，頁136-151。
13. 賴澤涵，〈廣州革命政府的對外與對外策略：民6年-14年〉，收錄於高純淑編，《中國國民黨黨史論文選集》，第四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83年，頁1-92。
14. 蘇雲峰，〈民初之商人（1911-192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1年7月，頁47-82。
15. 樂正，〈近代上海的崛起與廣州的失落〉，《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4年8月號（總期第二十四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4年8月。

（三）專文

1. 丁長清，〈試析商人會館、公所與商會的聯繫與區別〉，《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北京：近代史研究雜誌社，1996年5月，頁302-309。
2. 朱葉，〈清末新式商人社團的興起及其影響〉，《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4期，北京：經濟研究雜誌社，1989年，頁74-87。
3. 朱葉，〈清末新興商人及民間社會〉，《二十一世紀》，3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民國80年2月，頁37-44。
4. 呂芳上，〈廣東革命政府的關稅交涉〉，《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第一冊，台北，民國73年6月。
5. 李達嘉，〈上海商人的政治意識與政治參與（1905-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期（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2年6月，頁171-219。
6. 李達嘉，〈上海商人与五卅運動〉，《大陸雜誌》，79卷1期，台北市：大陸雜誌社，民國78年7月，頁17-32。

（四）報紙

1. 《大公報》，長沙，民國元年至民國13年。
2. 《申報》，上海，民國元年至13年。
3. 《華字日報》，香港，民國元年至民國13年。
4. 《廣州民國日報》，廣州民國12年至18年。